宪法学国家结构形式范畴形成史考略

童之伟

在权威性文献中,国家结构一词最早见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它作为一个宪法的概念是随着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而确立的,50年代我国宪法学界从苏联引进了这个词并发展成了两个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概念——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概念的形成在世界范围内丰富了宪法学范畴体系。

国家结构一词自苏联传入我国以来,已发展成为国家结构形式这一具有我国特色的宪法学范畴。为了加强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和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弄清这个范畴的来龙去脉。

一、国家结构一词的来源

“国家结构”一词不是从一开始就以一个宪法学基本概念的面目出现的,它当初只是一般性语词,而且含义并不十分确定。在权威性文献中,最早出现国家结构一词是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说:“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①他接着又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类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类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类是关于地方自治。”^②从列宁这部著作的上下文看,以上引文中两次提到的国家结构的含义都等同于现在我国宪法学中的国家结构形式概念,该词第一次出现其俄语原文是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而第二次出现则是 устрой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第一个词组中用了斜体字表示强调,故中文译文的国家二字打了着重号。由于与国家结构对应的词组在俄文中有多重含义,译成中文时也就有多种译法。所以,这同一个词组在列宁后来的著作中又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拿国家结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看不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看不到。”^③在这里,根据上下文判断,“国家结构”一词无疑指的是国家机构或国家制度。

“国家结构”从一个随机组合的合成词组转变为一个确定的宪法学基本概念是本世纪30

年代的事。对此,当年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的国家法教科书写得很明白:“斯大林宪法草案公布以前,在苏维埃著作中,‘国家结构’这一术语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界说。有些人将国家结构理解为管理形式、国家制度、国家的政治形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织和构造等等。斯大林宪法给了这一术语以完全的明确性,将关于国家结构问题与相近的诸问题予以分界,特别为国家结构问题真正科学的分析创造了条件。”^①这一说法是实事求是的。准确地说,国家结构作为一个含义确定的宪法学基本概念的地位,是从1936年6月12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草案》那天开始确立的。这个宪法草案于1936年12月5日经苏联苏维埃第8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并成为苏联宪法,即通常所说的斯大林宪法。该宪法第2章的标题就是“国家结构”,与当初公布的宪法草案相同。在此40余年之后,即1977年10月7日,苏联第9届最高苏维埃非常第7次会议通过了一部新的苏联宪法,这部宪法完善和发展了原宪法中国家结构的内容,在原第2章的基础上扩充为共4章的一编,并冠之以“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的总标题。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基本研究对象的。自苏联1936年宪法生效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国家法体系一直将国家结构作为其基本范畴之一加以界说和研究。不论是建国初引进的苏联国家法教科书,还是80年代翻译的以苏联1977年宪法为主要论述对象的宪法学著作,都表明了这一点。

二、国家结构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

国家结构这个概念,在我国是逐步定型的。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我国通用的国家结构这个概念,是从苏联国家法学中引进的^②。这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但它最初传入我国时并不译为国家结构。据笔者考证,这个俄文词组的中文译法最初见于194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并传入我国的1936年苏联宪法中文本^③,译为“国家机构”。50年代初,我国也有宪法学者在其著述中沿用这种译法^④。

我国宪法学界将上述俄文词组统一译为“国家结构”是我国1954年的宪法颁布前后的事。1949年之前,我国学者编撰或翻译出版的宪法学著作没有使用过“国家结构”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任何其他语词来概括由国家结构一词所包含的内容。1954年宪法颁布后,我国学者开始较多地在他们编撰的书籍中使用国家结构这一术语来概括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关系。例如,有的宪法学参考资料开始将“国家结构”与“国家机构”等并列作为目录的分类标题。而此时“国家机构”一词的含义只是指国家机关体系。同时,也出现了用国家结构这一语词,从国家整体与其构成区域关系的角度阐释我国宪法关于认定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条文的作法^⑤。

在50年代,由于宪法学界引入国家结构这个概念的时间还不长,在运用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需要通过逐步统一认识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似乎不太习惯、不太愿意或认为不太适于用国家结构或国家结构形式概念来说明我国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关系,所以存在着本来运用这个概念更能说明问题但却避而不用的情况。二是引入这个概念后,在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时,对其内容未及时作适应性调整。如有一本教材这样写道:“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与其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实际上也就是民族关系问题”^⑥,意即我国的国家结构问题就是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对国家结构概念的界定方式

对苏联是恰当的，因为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是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自治共和国也都是民族国家。我国虽然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我国情况不同于苏联，因而国家结构在我国首先表现为国家整体与一般行政区域的关系问题，其次才是国家整体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问题。所以，那种认为我国国家结构问题与苏联一样实际上是民族关系问题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是简单地照搬苏联的说法。三是将国家结构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不加区分而相互混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现在。在1956年之后的20余年间，宪法学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有关国家结构问题的学理性探讨自然也不可能有成效地展开。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以后，宪法学研究和教学活动得到了恢复。10多年来，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已得到宪法学界认可并被普遍使用，对它的界定方式也逐渐摆脱以前苏联宪法学界的影响，具有了民族的形式并大体上适应了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需要。当然，对这个问题象对待任何其他问题一样，不同的意见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从苏联国家法中引进的这个词组，虽然选用了国家结构的译法，但毕竟“结构”一词同“制度”、“体制”在含义上不好区分，而从它的实际含义看，指的是从国家的整体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上看的国家构成，是直接表示领土的组合方式、解决政权组织的建立和管辖的空间范围问题。因此，把目前使用的国家结构一词改为国家区域结构要好一些，长处是符合汉字组词的含义，意思明了，且易于排除可能发生的误解^⑧。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国家结构改为国家区域结构并无太大必要，因为结构一词在俄文中虽与制度、体制的含义不好区分，在汉语中并无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宪法学界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术语并赋予了它十分确定的含义。

三、国家结构与国家结构形式概念的联系考察

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应该看作是既有紧密联系，同时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概念。但是，不论是在原苏联的宪法学者中，还是在当今我国宪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如果将国家结构形式理解为国家结构在特定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么有国家结构这个概念自然就会派生出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从我国已经出版的原苏联的国家法著作的中译本看，当时苏联的宪法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分别表现出两种倾向：有些学者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国家结构的形式”之类语词，似乎认为国家结构这个语词就足够说明有关现象了^⑨。另一些学者则根据不同的需要，既使用国家结构一词，又使用国家结构的形式一词，显然是将它们当作两个不同的语词看待的^⑩。严格地说，“国家结构的形式”同现在使用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词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一个形容词同一个名词根据需要临时构成的，就像“国家结构的实质”、“国家结构的内容”等随机组成的词一样。而“国家结构形式”从构词法上看是完整统一的，具有专业术语的特征，而“国家结构的形式”这一词组不具有专业术语的特征。事实上，即使是使用“国家结构的形式”这一语词的学者，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来界定过，显然是认为它没有作为独立概念的价值。

我国宪法学界在引入了国家结构概念以来，对于是否应提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结构形式概念，看法也不一致。对这个问题，曾有的和现在仍通行的处理办法可归结为以下四种：第一种处理办法是将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看成表述同一个概念的同义词，认为两者实际上

无差别。在这点上,《辞海》解释国家结构一词时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国家结构,即国家结构形式”。第二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受原苏联法学界前述第一种倾向的影响,基本上只承认国家结构的概念,一般不使用国家结构形式一词,而偶尔使用时显得似乎是迫不得已,往往给人以既不愿突破已有的概念框架又想要准确详细地分析研究对象的印象。1984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家结构”这个辞条的写法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第三种处理办法是只使用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而不同时使用国家结构的概念,这种处理方法现在比较普遍。采取这种处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认定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是一回事,是表达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语词,而且认为用后一个词语比用前一个更为确切。反之,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假定这些学者将国家结构形式看作国家结构所采取的具体表现形式,那就无异于作者承认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而他们忽略了对国家结构这一概念作必要界定。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这些学者的原意。有两点应当指出:1. 如果认定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只是表述同一个概念的两个语词,那么,采用后一个语词确实更为确切;2. 由于这些学者放弃了国家结构的提法,因而使原来“国家结构的形式”转变成为“国家结构形式”,逐渐使这一原本附属于国家结构概念的随机组合的用语取得了宪法学专门术语的地位,从而促成了一个与国家结构概念有联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概念的确立。这应该被看作是对我国宪法学概念体系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至于说将国家结构这一术语弃之不提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第四种处理方法是虽不专门说明,但实际上将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将国家结构形式理解为国家结构在特定国家所采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处理方法基本上与苏联学者特拉伊宁在其国家法教程中的安排是一样的。这种做法有其优点,但若说明了两者的关系以及这样处理的理由则更好。

概念是反映事物属性的,此事物同彼事物关系不管多么密切,只要两者间的属性存在差别,就应该而且必须以不同的语词来加以概括和体现。正因为如此,概念的发展分化程度才往往反映出人们对有关事物认识的深入程度。国家结构就是国家结构,国家结构形式就是国家结构的形式或者说其所采取的形式,是有联系但又有不同属性的两个概念,正如民主和民主形式、衣服和衣服式样分别是两个有紧密联系又有不同内容的两个概念一样。概念的分化是人们对于事物或现象的认识深化的结果,同时又是加深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的前提条件。

将国家结构与国家结构形式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必要的。应当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有的范畴、概念体系;范畴是概念,但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基本概念。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都是宪法的概念,但国家结构只涉及事物的一般的和抽象的方面,只有国家结构形式才能涉及事物的具体方面,才谈得上分类和发展演变,从而才能成为宪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所以,两相比较,尽管都是宪法的概念,但其中只有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是基本概念,构成宪法的范畴。

四、提出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概念的学术意义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我国宪法学界在从原苏联国家法学中引进了“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的形式”两个语词后,经过宪法学界的共同努力,发展成了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两个定型化的宪法学术语。在辨明了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后,它们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的地位就得到了确认。

国家结构与国家结构形式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宪法学概念体系。不仅如此，国家结构形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已成为宪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而也充实了宪法学的范畴体系。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宪法学作出的一个贡献。人们对1936年苏联宪法贬褒不一，那是政治问题，见仁见智，另当别论。但从学术上看，不可否认，在这部宪法提出国家结构概念并由学术界予以阐释之前，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宪法学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在含义上概括或包容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术语。这是各国宪法学概念和范畴体系都存在的一个缺失环节。我国和原苏联的宪法学者通过著述活动弥补了这一缺失，可说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学界的这一学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管是我国已翻译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辞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还是近10年出版的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 和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等著名辞书，都没有“国家结构形式”或“国家结构”的词条，西欧、日本、美国等出版的宪法学和政治学著作中也找不到它的踪影。甚至日本的某些宪法学著作不得不将1977年苏联宪法第三部分“民族国家结构”意译为“连邦制”（即联邦制）。但是，用一个概念概括单一制与联邦制是一种客观需要。欧美学者在必须使用一个概念表达“国家结构”或“国家结构形式”的意思时，只好用随机组合的词来表达。例如，荷兰学者就使用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来表达与国家结构形式一词相同的含义，这个语词，虽包括了我們所说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涵义，但却同时也包含有政体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涵义，实际上相当于我国政治学中的政治形式这一术语。西方国家宪法学中没有国家结构和国家结构形式概念而又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学中引入，并不是这些国家语言的表达能力不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学的这一成果，而是故意忽略它。这倒是或多或少说明了有关国家宪法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和学术文化成就的一种盲目排斥态度。但是，一国采用的学术概念如果是必要、合理和科学的，总是能够推向世界的。

注 释：

- ①②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28、229、633页。
- ④⑫ 特拉伊宁等编：《苏联国家法教程》上册（彭健华译），大东书局1951年中文版，第223、254页。
- ⑤⑩ 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 ⑥ 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料室仍保留有苏联宪法的这种版本。
- ⑦ 魏黎仁编：《苏联宪法常识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有关章节。
- ⑧⑨ 中国政法干校国家法教研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有关章节。
- ⑪ 见卡列娃、费其金主编：《苏维埃国家和法的基础》，法律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库德里亚采夫等：《苏联宪法讲话》（刘向文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这两本书的作者有这种倾向。

（责任编辑 车 英）